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青海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汇聚文学之力

——青海省作协推动各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综述

□邢永贵

2025年9月13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治曲路上的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一支由80多名各民族作家组成的队伍从感恩广场向馆内缓步行进。在藏族讲解员的娓娓诉说中，作家们在纪念大厅依次献上洁白素雅的菊花，缅怀那场地震中的遇难者和牺牲的援建者。在“大爱无疆”展区高高矗立的鲜红色的功勋墙上，作家们找到了一行醒目的金黄色文字：中国作家玉树抗震救灾采访团。这个光荣集体的名称，排列于225个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阵列中，让作家们为之自豪的同时，也让作家们对“中国作家”四字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个身份不仅意味着要在文学世界里勤勉求索，更要具备在重任面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果敢担当。

队伍中的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正是那次采访团的团长。2010年4月16日，震后第3天，12名省内外作家组成的采访团，在冷冽的清晨从西宁乘车出发，目的地就是让人揪心的800公里外的玉树。可一路上山高路险、风疾雪狂，直到午夜时分，连续行车17小时的他们终于抵达受灾最严重的结古镇。从采访团踏上玉树土地那一刻起，中国作协对玉树的牵挂与支持持续不断。其间向玉树州派遣五批次60多名作家采访团开展文学主题实践，青海省作协同步组织省、州、县创作力量加入采访团，贯穿抗震救灾、全国援建、重建家园、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历史性时刻，涌现了《玉树大营救》《废墟上的花朵》《心迹语语》等一批创作成果。在中国作协的关心与支持下，玉树州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康巴文学》诞生于重建帐篷中。15年来，玉树州文学工作者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玉树州文学事业百花绽放、硕果飘香。所属6个市县全部成立作协，6个市县均创办有文学内刊，省作协会员人数从8人增至78人，中国作协会员由全州仅有1人发展到8人，其中1人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康巴文学》出版14年共50多期，让更多优秀的玉树作家作品走向全国。品牌文学活动“唐蕃古道诗歌季”连续举办4届，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在三江源头赋诗放歌，诗意洒江源，文赋新玉树。

正是基于这克服成绩，2025年9月，青海省首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玉树，为挖掘玉树特色文化、推动基层文学创作、以文学赋美乡村注入新动能。中国作协副联部主办的“新时代新玉树新生活”文学主题实践活动同期启动，来自全国的作家团队，走进玉树草原、雪山与村落，深入挖掘玉树故事，书写三江源头的生命赞歌，用文学作品展现新时代玉树的巨变。这一刻，是对15年前那次特殊采访穿越时空的呼应，不同的是，呈现在作家面前的图景，已是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新玉树，作家们面对高山净土、江河巨流，既兴奋激动又轻松惬意。

不仅仅是玉树，哪里有生动实践，作家的笔锋就抵达哪里。从拓荒者面对雪域高原的真诚礼赞，到柴达木戈壁上诗人的手记；从伟大工程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到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脱贫攻坚现场；从原子城、红军沟的红色畅想，到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时代强音；从《青海，我的家园》中各行业代表性人物的娓娓诉说，到“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一线的倾听与采写；从连续举办12年的“中国梦·青海故事”征文到新时代系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实践，青海作协的组织力量始终在延伸中创增，而青海各民族作家的担当也在足职足责中得以彰显。于是，青海文学的百花园里，飘荡着《柴达木小调》《环绕着的故事》《西部高原采风》《古盐湖》《世界屋脊神曲》《喜马拉雅之谜》《走进柴达木》《日出昆仑》《昆仑殇》《青藏大铁路》带来的馥郁芬芳，也点现着《瀚海追梦》《一村一诗》《红色青海》《榨样的力量》《石榴花开在青海》《青海：新时代山乡巨变》《新青海的答颜》《青海生态文学作品集》的鲜妍明媚。

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石榴花开在青海》吴德军、梅卓主编。

《康巴文学》2025年第1期

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地理地貌呈阶梯形变幻，海拔从2000多米到6000多米逐步爬高，山地、盆地、戈壁、荒漠、荒漠草原、高山草原、湖泊、雪山，造就了地球上罕见的壮丽景观。山宗水源的青海，是昆仑神话的故乡。各民族聚居于此，文化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现湟湖绽放的图景。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各民族作家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共同编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盛景，使青海文学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丽格局。

2

在青海，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49.47%。6个自治州、7个自治县和28个民族乡的行政区域面积总和占全省总面积的98%。毫无疑问，青海是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最大的省。特殊的省情决定了民族工作不仅是局部工作，更是关乎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国之大者”和“省之要事”。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青海，民族文学工作既是文艺工作，也是民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省作协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把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中之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的伟大事业中积极作为，团结引领全省各民族作家，推动青海民族文学事业从“高地文学”向“文学高地”跨越，书写了一份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时代文学答卷。

2024年起，青海省作协连年与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等共同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海文学笔会和文学实践活动，邀请全国各地作家参加，“人民艺术家”王蒙题词“中国梦，青海篇；同心曲，一体圆”，预祝笔会取得圆满成功。白庆胜、杨志军、索南才让作主旨演讲，引发现场作家强烈共鸣。100多名全国作家不顾“高反”，认真出席笔会，踊跃参加采访考察，分赴河湟谷地、祁连山国家公园、热贡艺术之乡、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多地采访，深入了解青海历史文化底蕴，探访青海各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丰富实践。与会各民族作家一致表示，多元文化在青海交相辉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文学工作者，应当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理解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一体走向更大趋势，以灿烂的文学之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绚丽绽放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讲好新时代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中国故事，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文学力量。活动期间，青海省民宗委与青海省作协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共同印发的《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精神在青海贯彻落实。举办一期鲁迅文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作家培训班，在海东等地举办《文艺报》《民族文学》资深编辑主讲的文学讲座5场，让优质文学资源直达基层，400名来自8个市州的基层作家获得了难得的培训机会。作为配套活动，《石榴花开在青海》主题创作实践在8个市州同步开展。纪念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暨青海各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回顾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年青海各市州文学事业发展成就和各民族文学创作业绩，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明确发展目标，团结凝聚文学合力。活动成果丰富，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石榴花开在青海》，在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提振了全省文学界信心。

而承担中国作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三套丛书项目，堪称青海在推动民族文学方面的大手笔。编选完成“新时期”系列丛书藏族卷、土族卷、撒拉族卷3部4册，总字数120万字，为青海文学创作梳理脉络、建立档案。组织申报10位藏族作家的“五个一工程”奖，百花文艺奖、冰心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金近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芳草》杂志“汉语文学大评委大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个人奖及多个省级作协、产(行)业作协评选的专业文学奖项。100多名作家获得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扶持等系列创作扶持项目。

人才是文学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青海省作协高度重视作家队伍建设，着力构建老中青相结合、各民族共同均衡发展的作家梯队。这支队伍正是在一代代作家格桑多杰、触文志、王贵如、王文泊、察森敖拉、多杰才旦、马丁、祁建青、才旦等时有新作问世，梅卓、马钧、海榮、古岳、马海轶、龙仁青、耿占坤、刘晓林、杨廷成、扎西东主、曹有云、马非、久美多杰、德本加、卓玛、江洋才让、索南才让、王丽一、那萨、郭建强、曹建川、撒玛尔罕、李明华、赤·桑老、李万华、唐明、横扫天蓬等中坚力量的创作不断取得突破。更年轻的作家则正在成长、未来可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青海民族作家构成了一道有着高原形体的独特形象，成为青海文学的引领者和代言人。

4

重要文学活动是文学事业对外交流与展示平台，为作家成长创造了难得机缘。青海湖诗歌节作为持续18年的品牌诗歌活动，为青海诗人、作家参与当代诗歌与世界诗歌的互动搭建了平台，数以百计的青海诗人融入其中，为打造诗歌高地汇聚了本土力量。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通过诗集签赠、公益诗歌大讲堂提升了文化获得感。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是青海湖诗歌节的延伸和拓展，先后在海北、黄南两州举办三届，推动青海诗歌交流走向深入。设立昌耀诗歌奖，并持续举办五届，对与社会力量共同举办文学奖项，打造青海文学品牌奖项、促进青海诗歌对外交流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探索。

青海省作协在文学领域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文艺援青工作部署，先后与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省市作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丰富交流活动，成果丰富。浙江省作协将两省市县级作协结对推向深入，上海市作协在果洛州设立援青创作实践点，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作协在作家培训、创作项目扶持等方面定点扶持青海作家，使得文学扶持力量倍增，基层作家普遍受益。

5

“做人的工作”中蕴含着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学的秘诀。进入新时代，青海省作协贯彻落实深化改革要求，顺应网络作家队伍变化新形势，重时度势成立网络文学委员会，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引领和对网络作家的组织引导。

出版精品集，为时代存档，是青海省作协长期坚持的举措。青海省作协组成编委会，按沙推金，精选优秀作家的优秀之作，编选出版《青海文学十年》《青海当代文学50年》《建国50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4卷本)《建国60周年青海文学作品精选》(5卷本)《青海文学十年精选丛书》(6卷本)《野牦牛翻译文学十年精选丛书》(4卷本)，在时间长河中留存了昌耀、杨志军等一代代青海作家群体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创作与发展印迹。这期间，青海作家网、《青海作家》作为信息共享与创作阵地，也曾一度在客厥的时空里闪现存日之光。

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分享会是青海省作协推动各民族作家交流交融的温情之歌。上海汉族少年幽怡林到草原做客，藏族小伙伴带着他去体验“挤牛奶”“放牛羊”等牧事活动，并用酥油茶等草原食物招待远方来客；而幽怡林带来的糖果美食，他所讲述的城市故事，又让生活在草原上的藏族小伙伴感到好奇，“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在孩子们的纯真友谊中得以相互映照、相互滋养，从而形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和联想。这种双向视角的相互交织，让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于潜移默化中催生出动人的光彩，也让主人公从最初对草原的陌生，转变为“探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198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省儿童文学作品集”收录了《远方的小客》，并以它的篇名作为全书的书名。青海省著名文史学家朱世奎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这部作品“平凡中出神奇，细微处见精神”。

不独《鹞群》《远方的小客》，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察森敖拉总是通过一个个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以一种“不着意强调而自然流露”的创作智慧，努力呈现海北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样貌和魅力，让“多元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变得可感可触、可传可颂。

当然，在构筑多民族文化视野的同时，察森敖拉并没有忘记自己蒙古族的民族身份。他以作家的敏锐洞察力捕捉着这样一个时代命题，即面对现代化的汹涌浪潮，民族作家应当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根脉？在中篇小说《你也是蒙古人》中，主人公既眷恋草原的游牧生活，又不得不直面城市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既珍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又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调适自我。作品通过人物内心的抉择与挣扎，揭示了民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标签，而是一个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在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祁连游牧仔》中，察森敖拉塑造了达尔杰、卡布龙等一系列鲜活的牧民形象。他们既是游牧文化的践行者，熟悉草原的季节规律、知晓牛羊的饲养技巧，坚守着“敬畏自然”的传统理念，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面对新形势和草原牧民的新期待，他们不得不思考游牧文化的未来。老牧人达尔吉对狼崽“黑嘴巴”的宽容，对少年超尘的引导，不仅是对民族文化中“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理念的传承，从中也展现出民族文化在时代浪潮中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察森敖拉以和连山草原为背景的民族书写，还蕴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上海文学》(1982年)推出了中篇小说《放生》。这部作品应当是青海生态文学的“先声”，其意识的超前性令人由衷钦佩。《放生》的主人公老卡布龙是远近闻名的猎人，猎枪与捕兽器是他征服自然的工具，也是他维持生计的依靠。但在救儿子上山狩猎的过程中，看到被捕兽器束缚的小鹿苦苦挣扎，目睹草原上的飞禽走兽日渐稀少，再加上儿子横仿自己“杀生”时的天真模样，内心的愧疚与不安日益强烈。最终，卡布龙收起捕兽器，将家中喂养的小鹿、马鸡全部放归山林——这一“放生”行为，既是对野生动物的救赎，更体现出他自我认知的觉醒，说明他已完成了从“猎人”到“自然守护者”的转型。作品中“野鹿带着鹿羔跟在他身后久久不愿离去”的细节，不仅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展现出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趋势。

近年来再版并获得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天敌》则以儿童视角，再次展现了“和猎共生”的生态图景。生活在“世界病灶”“生命价值”等终极问题的讨论。远在西亚发生的事件，如今已经同步在世界各地传播。华洛由此生发的思辨，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展开的。世界的结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又是如何镶嵌于世界的结构之中？作家综合使用本地的历史材料和本土的知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多杰才旦叙事的动力和支点。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和流变、人类文化的生机和朝向，以及人本身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生命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和理解，密布在多杰才旦的小说之中；尤其是汉藏文化和文学资源调动，汉藏语言表达方式的同用，更是清晰地标明汉藏一家同生共命。这一点在《堂吉诃德八世》的小说语言中，得到了充分而直接的表达。语言是人类借以思维和交互的一个意义结合的系统，是一个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系统。对于一些语言哲学思想家而言，语言即存在，甚至意味着一切。对于以语言为工具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和诗人，语言是风格，更是根本，是世界和心灵的反映。在《堂吉诃德八世》中，多杰才旦运用汉语雅言和俗语的熟稔程度，显示出作家的文化根底，也表现出在青海这片民族大融合的厚土上，各个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共为一家是历史和现在的事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第一章，华洛先用藏语朗诵《莲花生本纪》的预言，接着又用汉语套改和朗诵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段话，用两种语言共同地指向了贪婪愚顽的社会病灶，表现了这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意性。这是给华洛这位“堂吉诃德八世”所作的第一幅肖像。第五章叙述华洛创作长篇小说《草原雄鹰》的方式，就是华洛先用汉语口述，桑洛用自创的藏文速记法记录；然后桑洛再用藏文口述，华洛则用汉语翻译、记录、加工。这个过程既是华洛和桑洛的重要合作，也是汉语和藏语的深度互换和融合。用汉藏两种语言来描述、构建，意味着从文本到现实，再到精神的一种共在和创造。在语言(长篇小说)的生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和生命、社会、文化建立了对应关系，而新的文本和本文也得到了呈现。

多杰才旦在《堂吉诃德八世》中汉藏文化和语言表达的同用，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毛泽东诗词、格萨尔史诗，李白、杜甫、文天祥和《莲花预言》《度母颂》相映成趣。不仅如此，作家还深谙汉语民间文化，对于汉语和汉文化的多层理解，极大地助力作家精准地描写时代的特征和精神，同时有力地加深和拓展了小说反观、反思和探讨的范围和深度，强化了现实质感，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实现了为时代代言的初衷。

(作者系青海省文联文学创作与理论评论中心主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2025年9月13日，作家代表团在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考察

2025年青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实践活动现场

2025年9月，“新时代新玉树新生活”文学实践活动作家代表团合影

描述我们共同的现实和精神

——读多杰才旦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八世》

□郭建强

多杰才旦的文学呈现有别于青藏地区沉浸于自然和风俗描绘的作家，也和着迷于历史和文化的作家明显不同。多杰才旦甫一创作，小说的笔触即着力当下和现场。也就是说，作家依凭自身处于现实的敏感，呈现出近半个世纪以来青藏地区的种种历史性变化和变迁。作家正是通过这些地域生活和文化符征明显又富有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场景和人们的内心感受，描绘出剧烈的社会发展轨迹。多杰才旦的文学描绘，还一地而不限于一地，讲一地之人而不囿于一地之人，表达的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尤为可贵的是，多杰才旦的小说极具反思的气质和力量，作家通过设置于较高处的“观察台”，描述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从更为长远的时空角度反观汉藏传统文化在当下如何实现发展和新生，试图在这种反思中讨论社会、文化和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找到更加健康的发展之路。

《堂吉诃德八世》是多杰才旦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他大半生的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经验。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对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空间包括城乡牧区的学校、机关、街市、草原、田野等自然和文化区间，增强了小说的延展度和对比度。多杰才旦从主人公华洛的六个绰号写起，写到第六个——华洛藏上“堂吉诃德”这个充满调侃味道的“冠冕”，才算真正给小说人物的形象定了型，也给小说的内容定了调。华洛的经历、思绪和堂吉诃德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堂吉诃德以自己的可笑，反映出当时西班牙社会遍布的更加可笑的种种粗鄙和虚弱，进而反向丰富和深化了这位迷信于书本的“游侠和骑士”的精神内涵。在华洛身上，尽管同样体现了堂吉诃德式的忧虑和思辨，却少了喜剧的色彩，降低了喧闹的音量，趋近于汉藏古贤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端肃。也正是力图以全部和全体的方式来呈现共有的命运和感受，使得华洛所经历的社会现场和人生感怀，超越了地区和民族的局限，显示出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相近和差异，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形成了文本和现实双重互映的意味。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桑洛科质而温和，勤奋好学，很快便当上了教师。教师、文秘、文学工作者等多重身份的转换既为他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积累，也为他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写作空间。

仙米位于青海北部，是一片被祁连余脉滋养的土地，也是一片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土地。察森敖拉自幼与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小伙伴一同放牧，一同成长，这种“沉浸式”的生活体验让他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有了直观的理解与认知。但熟悉仙米的一草一木，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这些特有的“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最终都转化为他创作的营养，使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多元共生”的道路。他从不股着于单一的蒙古族民族叙事，而更钟情于兼有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叙事的文学表达。在他的笔下，各民族文化如同草原上的花草一般自然绽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代表作《鹞群》以青海农村为书写背景，将蒙古族、藏族、汉族的习俗、风情巧妙地交织相融：下乡干部被称为“查工作”的方言表述，餐桌上“仍然是青稞面刀把，只是多了一道菜——炒洋芋片儿”等河湟地区农耕文化的生活细节；“一个羊羔嘴底下有一把草”等游牧民族俗语、俚语的频繁出现，无不展现出海北这片高天厚土特有的文化基因和语言习惯。包括文中穿插的“花儿”唱词、蒙古族谚语，既无刻意显摆的匠气，也无生硬植入的违和，反而让读者感觉到它是人物情感自然而然的表达，是浓郁的“青海风”，也是海北地区多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具体表现。这既是察森敖拉对青海大地多民族共居的真实描述，也是多民族文化在雪域高原日常烟火中相互滋养、共美共生的生动写照。

中篇小说《远方的小客》以孩童视角，谱写了一曲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温情之歌。上海汉族少年幽怡林到草原做客，藏族小伙伴带着他去体验“挤牛奶”“放牛羊”等牧事活动，并用酥油茶等草原食物招待远方来客；而幽怡林带来的糖果美食，他所讲述的城市故事，又让生活在草原上的藏族小伙伴感到好奇，“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在孩子们的纯真友谊中得以相互映照、相互滋养，从而形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和联想。这种双向视角的相互交织，让草原文化与城市文明于潜移默化中催生出动人的光彩，也让主人公从最初对草原的陌生，转变为“探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198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省儿童文学作品集”收录了《远方的小客》，并以它的篇名作为全书的书名。青海省著名文史学家朱世奎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这部作品“平凡中出神奇，细微处见精神”。

不独《鹞群》《远方的小客》，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察森敖拉总是通过一个个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以一种“不着意强调而自然流露”的创作智慧，努力呈现海北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样貌和魅力，让“多元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变得可感可触、可传可颂。

当然，在构筑多民族文化视野的同时，察森敖拉并没有忘记自己蒙古族的民族身份。他以作家的敏锐洞察力捕捉着这样一个时代命题，即面对现代化的汹涌浪潮，民族作家应当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根脉？在中篇小说《你也是蒙古人》中，主人公既眷恋草原的游牧生活，又不得不直面城市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既珍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又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调适自我。作品通过人物内心的抉择与挣扎，揭示了民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标签，而是一个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在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祁连游牧仔》中，察森敖拉塑造了达尔杰、卡布龙等一系列鲜活的牧民形象。他们既是游牧文化的践行者，熟悉草原的季节规律、知晓牛羊的饲养技巧，坚守着“敬畏自然”的传统理念，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面对新形势和草原牧民的新期待，他们不得不思考游牧文化的未来。老牧人达尔吉对狼崽“黑嘴巴”的宽容，对少年超尘的引导，不仅是对民族文化中“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理念的传承，从中也展现出民族文化在时代浪潮中守正创新、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察森敖拉以和连山草原为背景的民族书写，还蕴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上海文学》(1982年)推出了中篇小说《放生》。这部作品应当是青海生态文学的“先声”，其意识的超前性令人由衷钦佩。《放生》的主人公老卡布龙是远近闻名的猎人，猎枪与捕兽器是他征服自然的工具，也是他维持生计的依靠。但在救儿子上山狩猎的过程中，看到被捕兽器束缚的小鹿苦苦挣扎，目睹草原上的飞禽走兽日渐稀少，再加上儿子模仿自己“杀生”时的天真模样，内心的愧疚与不安日益强烈。最终，卡布龙收起捕兽器，将家中喂养的小鹿、马鸡全部放归山林——这一“放生”行为，既是对野生动物的救赎，更体现出他自我认知的觉醒，说明他已完成了从“猎人”到“自然守护者”的转型。作品中“野鹿带着鹿羔跟在他身后久久不愿离去”的细节，不仅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展现出雪域高原生态向好的趋势。

近年来再版并获得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天敌》则以儿童视角，再次展现了“和猎共生”的生态图景。生活在“世界病灶”“生命价值”等终极问题的讨论。远在西亚发生的事件，如今已经同步在世界各地传播。华洛由此生发的思辨，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展开的。世界的结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又是如何镶嵌于世界的结构之中？作家综合使用本地的历史材料和本土的知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多杰才旦叙事的动力和支点。他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和流变、人类文化的生机和朝向，以及人本身对于生命的理解和生命的创造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受和理解，密布在多杰才旦的小说之中；尤其是汉藏文化和文学资源调动，汉藏语言表达方式的同用，更是清晰地标明汉藏一家同生共命。这一点在《堂吉诃德八世》的小说语言中，得到了充分而直接的表达。语言是人类借以思维和交互的一个意义结合的系统，是一个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系统。对于一些语言哲学思想家而言，语言即存在，甚至意味着一切。对于以语言为工具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和诗人，语言是风格，更是根本，是世界和心灵的反映。在《堂吉诃德八世》中，多杰才旦运用汉语雅言和俗语的熟稔程度，显示出作家的文化根底，也表现出在青海这片民族大融合的厚土上，各个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共为一家是历史和现在的事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第一章，华洛先用藏语朗诵《莲花生本纪》的预言，接着又用汉语套改和朗诵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段话，用两种语言共同地指向了贪婪愚顽的社会病灶，表现了这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意性。这是给华洛这位“堂吉诃德八世”所作的第一幅肖像。第五章叙述华洛创作长篇小说《草原雄鹰》的方式，就是华洛先用汉语口述，桑洛用自创的藏文速记法记录；然后桑洛再用藏文口述，华洛则用汉语翻译、记录、加工。这个过程既是华洛和桑洛的重要合作，也是汉语和藏语的深度互换和融合。用汉藏两种语言来描述、构建，意味着从文本到现实，再到精神的一种共在和创造。在语言(长篇小说)的生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和生命、社会、文化建立了对应关系，而新的文本和本文也得到了呈现。

多杰才旦在《堂吉诃德八世》中汉藏文化和语言表达的同用，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毛泽东诗词、格萨尔史诗，李白、杜甫、文天祥和《莲花预言》《度母颂》相映成趣。不仅如此，作家还深谙汉语民间文化，对于汉语和汉文化的多层理解，极大地助力作家精准地描写时代的特征和精神，同时有力地加深和拓展了小说反观、反思和探讨的范围和深度，强化了现实质感，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实现了为时代代言的初衷。

(作者系青海省文联文学创作与理论评论中心主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丰盈的暖意触摸大地

——马丁诗歌创作简评

□阿甲

许多年里，马丁是以“严厉”的文学编辑著称的，其敏业、负责和执着广为人知。这和“严厉”其实暗含了一种可贵的文学“尺度”，一种对文学的苛刻眼光。从更深的心理层面来看，这种“严厉”也源于对自身文学创作精益求精的严格。

马丁的文学创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正值新时期文学复苏，“朦胧诗”浮出水面，马丁先是列中央民族大学接受了文学知识的专业系统学习，此后又先后到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湖》杂志社任编辑，其间又到鲁迅文学院进行深造，这些专业学习和任职经历，奠定了他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基础。随着对自身创作根基的不断培植，以及创作主体心智的不断成熟，他逐渐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言说之途。那是一种自觉地倾向于民族文化根性和地域人文的诗歌写作，他以暖暖的爱意和精妙的文字，以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为河山代言，为民族立传，写出了让人瞩目的精彩诗篇。

寻绎马丁诗歌创作的历程，1989年与1997年是其个人创作中两个重要的节点。以此为分界，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探索发展时期(1982—1989年)、拓展完型时期(1989—1997年)和反思调整时期(1997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探索发展时期，马丁不断挖掘地域诗歌基因，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视野和诗歌主题，笔下渐渐展现出经由故乡、黄河、庄稼、夜晚、歌手、磨盘、土墙、月亮、泉水、黑狼、猎枪、河床、骆驼、鸽子、岩羊、毛驴、斧头、核桃树、榨木磨、白牡丹、绿盾头、羊皮筏子等意象群所构筑的浓烈一体的精神世界。这些乡土的事物，正如作者所言，是他的诗歌写作“永远走不出的背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对家园的深情吟唱中，马丁写出了《打墙》《迷拉里塔》《背山回家的女人》《夜鸟》《孟达峡》《仁望河滨》等优秀诗作和他的第一组颇具分量的长诗《羊皮筏和筏子客及老人的情绪》。

1989年前后，马丁的诗歌经历了一次蜕变，诗歌创作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的跃升，在多年的探索与沉淀后，他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细节及生命处境的体察上，这种转变与主流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高韶的关注公共生活的集体性写作转向20世纪90年代反省的关注日常现实处境的个体化写作几乎是同步的。马丁敏锐地回应般地写出了《独坐走廊》《夜间：你是谁》《无奈的经历》等一批充满内省和反思意味的力作。

另一个向度上的变化是诗歌写作题材和文化视野从乡土向青藏内陆游牧文明和本民族历史长歌直入的体悟后写出的一系列长诗作品。《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是对撒拉族迁徙历史的诗性回溯，《五月》是马丁回顾童年生活场景后写出的一组光彩夺目的乡土诗歌优秀作品。而长篇力作《生命的颂辞与挽歌》中，诗人以“死亡”与“诞生”对称的二重奏式结构展开了整部作品，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妙的“互文性”，深化了“家园”的“蕴涵”，在一种简约而清澈的叙述中，铸成了一座生命精神的丰碑。

以1997年的诗集《家园的颂辞和挽歌》为标准，之后的一个时期，是马丁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马丁的诗歌步入了反思调整时期，作品沿着前一时期的创作之路继续往前推移，一方面，是前期青藏地域精神的拓展和延续，另一方面，也现了较为密集的对日常生活处境的反思的诗歌，如《树的伤痛》《天视草原：他》《不足为奇》《塞尔维亚：雨中的骑子》等作品，对大时代里的个体命运充满温情的悲悯和深刻的警省，《不足为奇》以伤怀的心态写“还乡”经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还乡”其实已经变得不可能，童年的生活背景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置换，所谓“故乡”只剩下地理学上的一段路程、一个地标，心灵意义上能够给人慰藉的“故乡”已经远去。

马丁的诗歌创作是80年代“文化寻根”潮流的某种回应，由于生活环境、知识教育、文化心理、成长经历等取向上的多重背景，他的诗歌更多地体现出多文化元素“融合”的特征，如历史场景在日常经验中的质入，散文和小说叙事模式在诗歌中的运用，乡土经验在民族情感中的文化表现。马丁成熟期的诗歌创作在主题和题材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立身本民族古老精神根基的一种“文化主体精神”的挖掘和重建，将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有益尝试，这种“寻根之旅”导向了更为深阔的创作“密境”，造就了马丁诗歌容纳甚广的一次蜕变，诗歌创作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的跃升，在多年的探索与沉淀后，他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细节及生命处境的体察上，这种转变与主流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高韶的关注公共生活的集体性写作转向20世纪90年代反省的关注日常现实处境的个体化写作几乎是同步的。马丁敏锐地回应般地写出了《独坐走廊》《夜间：你是谁》《无奈的经历》等一批充满内省和反思意味的力作。

(作者系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用魔幻书写现实

——才旦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质

□刘大伟

在青海“50后”作家队伍中，才旦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小说家。仅以小说集《香巴拉的诱惑》为例，即可窥见其作品的特别之处——多篇小说标题中“世纪”一词的特殊使用，结构设置过程中梦境与现实的并列延展，以及人物命名时单个汉字与藏语名字的奇妙转换……无不展现出鲜明的创新意识。近期发表于《海南文学》(青海湖)的短篇小说《草客》(一次诡异的盗草)，为青海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草客”这一特定的文学形象，层管其他作家也涉猎过此类题材，然而才旦塑造的腊八和狗子这两个“草客”形象极为典型，令人难忘。

才旦的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使用上，这种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理念与方法，经由拉美作家的艺术转化，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型流派，于80年代初引入中国文坛，随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相继出现。才旦无疑是较早接收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并尝试将其转化为小说品类的青海作家。当然，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才旦并未停留在“神秘之象”的展示与猎奇上，而是通过形象的塑造、观念的传达、结构的设置和语言的地方性表述，走出了一条具有探索精神的小说创作之路。作家同来评价其作品：“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方式和具有探索性质的创作方法，反映了被许多人所热衷和推崇的那个特定的神秘之象和自然世界，以及对这种神秘之象和自然世界的深深思考和探索，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推崇和认可，而他的小说创作由此也有了质的飞跃。”

就小说集《香巴拉的诱惑》而言，才旦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同一文学素材的多种艺术处理上。譬如，他从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完成了短篇《红色袈裟》，这篇小说充满了象征、隐喻和魔幻色彩，作品中出现了“一百二十八岁的爷爷伺候着七十多岁的孙子”这样奇特的场景，还存在着“族长生病了，族人不能健康着，得跟族长一起病着，否则就是大不敬大不孝”如此奇特的认知观念。怎样揉救这个生病的家族？经由苦行僧的指点，族人们踏上了西迁的征途。正是这样的西迁，客观上造就了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现实。128岁的爷爷甚至提出了颇具现代性特质的想法：越过卡伦河，进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一个古老的族群用这样的认知与实践，慢慢达成了与文化“他者”的交流与共识，同时又用打开传统、放眼世界的胆识和魄力，提出了融入现代文明的设想。在草原文化语境里，这样的表达极具前瞻性，由此也展现出作家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寻出路的担当意识。

在现代文明的巨大浪潮中，游牧文化、草原传统将何去何从？导演万玛才旦用他的小说和电影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与追问，譬如电影《塔洛》对文化认同与物质追求进行了诘问，《气球》对转世思想与生育观念